

“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的发展路径、现实挑战与提升策略^①

胡德鑫,陈润歌

(天津大学,天津 300354)

摘要:作为应对新一轮产业革命的重大战略部署,“双高计划”对打造引领职业教育发展的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群,形成与区域经济发展同频共振的新格局有深远意义。研究结果显示,基于社会结构化理论的自主发展能力和外部支持力度作为划分依据,高职院校可划分为自主建构型、协同合作型、依附发展型和消极被动型四种风格迥异的发展路径。在具体实践中,高职院校尚面临缺乏整体建设思路、专业群运行机制不畅、产教融合模式单一以及内外推力匮乏等多重制度性挑战。进一步指出未来高职院校治理效能提升的有效路径,即:明确整体思路,突破常规提升质量;专业群实现精准对接,形成特色考评体系;产教融合多方协同,科学建构“双主体”责任;打造对内研发创新和对外合作交流双循环驱动。

关键词:双高计划;专业群;高职院校;社会结构化理论;产教融合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21)12-0104-07

DOI:10.16697/j.1674-5485.2021.12.013

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高职院校担负着为生产、管理、服务与研发等各种行业提供一线技术人才的重要使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自2006年,教育部启动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以来,职业教育已基本实现规范化,并逐步向内涵化建设迈进。在对职业教育进行长期酝酿和试点之后,国家又将其战略定位提升到一个更高的维度,即实现“高质量”的发展。2019年,教育部、财政部

联合发布《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简称“双高计划”),持续推进高职教育领域深化改革以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作为《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重点项目,“双高计划”的重要程度不亚于普通高等教育领域的“双一流”建设,是打造技术创新与技能人才高地有效制度安排,是提升高职院校治理效能的重要方案设计。高职教育所具有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双重属性使其重要性更加突出,“高质量”

收稿日期:2021-06-03

①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基于供给侧改革的新兴产业人才职业教育培训模式与策略研究”(17YJA880073)。

作者简介:胡德鑫,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陈润歌,天津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生。

不仅关系着人才培养的目标,同时也关系着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就业和社会的稳定。在深入推进“双高计划”背景下,职业教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攻坚区,因此本研究基于社会结构化理论的自主发展能力和外部支持力度作为划分依据,解析高职院校风格迥异的分类发展路径与基本特征。进一步分析当前高职院校发展中面临的共同时代挑战与难题,提出未来我国高职院校治理效能提升的有效路径。

一、高职院校发展路径分类设计与特征解析

社会结构化理论由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提出,它是在与功能主义理论对抗中产生的。该理论认为社会系统存在结构性特征,强调个人的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存在紧密的关系,其不仅受社会结构的制约,同时也是社会行动得以实践的前提与中介。社会结构主要由资源和规则两部分构成,前者强调社会行动所需要的分配性或命令性资源,是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不断再生产出来的;后者则强调在人们各种行动概括基础上形成的固定社会规范和法则^[1]。根据社会结构化理论的观点,类比从事,可将高职院校刻画成开放、多元的社会行动者,其与外部环境发生交互作用,一方面高职院校发展需要从外部环境获取资金、设备、人员等多样资源,另一方面其又必须遵守外部环境中的社会法则与秩序。这里的外部环境强调的是影响高职院校发展的中央或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研究机构、行业企业等,各利益相关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与需求倾向影响着高职院校的发展重点与改革方向。而高职院校整体作为社会行动者,其内部的管理制度、学科专业、师资队伍、课程与教学、绩效评价等错综链接形成的共同体,一方面必须遵循职业教育的特有规律和办学实际特色来开展教育教学,另一方面又必须对外部环境影响下的社会诉求做出有效回应。总之,高职院校内部的自主发展能力与外部环境共同的支持力度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塑造着高职院校各具特色的发展方向与行动轨迹。总体来看,以社会结构化理论的自主发展能力和外部支持力度为划分依据,高职院校的发展路径可划分为自主建构型、协同合作型、依附发展型和消极被动型四种不同类型。(见图1)



图1 高职院校发展路径分类设计矩阵

(一) 自主建构型

自主建构型高职院校自主发展能力较强,但获得的外部支持相对较少。此类高校一般办学历史较长、专业底蕴深厚,其学科实力与教学水平都处在高职院校的前列。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与劳动力需求结构的持续调整升级,此类高校的专业布局不能及时捕捉经济发展带来的人才需求变化,其培养的人才质量与社会实际需求脱节,间接导致学校办学资源相对紧张、毕业生就业率不高等衍生性问题。该类高校的改革重点方向在于对市场需求乏力的部分专业进行调整与转型,提升其与社会需求的适配度,更好地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以获得更多的外部社会资源支持。

(二) 协同合作型

协同合作型高职院校自主发展能力较强,获得的外部支持也相对较多。此类高校同样拥有较强的历史底蕴,并能够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及时对专业布局进行调整,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度较高,能获得较多的外部资源支持,并能够与行业企业在专业设置、科研平台、课程与教学、师资培训、实训基地等领域开展多样合作,实现多方共赢、协同发展。该类院校发展过程中同样可能出现一定问题,过度迎合社会需求,可能导致院校自身发展特色逐渐丧失。同时,此类高校一般会为迎合社会需求突击开设大量新的专业,这种“泛而广”的规模扩张型思路虽然在特定时间能够为自身发展赢得大量资源,但不符合专业建设长期竞争优势需逐步积累的基本规律。

(三) 依附发展型

依附发展型高职院校自主发展能力较弱,但能够获得较多的外部支持。此类高校一般办学历史较短,部分甚至直接是迎合社会经济发展需求

而新开设的,专业实力与传统高职院校存在差距,但因其与社会需求匹配度较高,因此能赢得较多的社会资源支持。该类院校应该遵循“集群发展、突出特色”的基本思路,以特色专业群建设为抓手,有效增强整体专业水平,提升其在高职院校群体中的学科竞争力。

(四)消极被动型

消极被动型高职院校自主发展能力较弱,能够获得的外部支持也非常少。该类院校缺乏内生性学科竞争力,也难以获得有效的外部资源支持,其发展困局由多方面造成:一是院校的自身办学特色不明显,与其他办学实力较强的高职院校专业布局呈现同质化的趋势;二是学校管理制度不健全,组织运行效率低下,难以形成高效的运作机制;三是专业建设与调整脱离社会经济发展实际,难以融入区域发展并促进产业升级。该类院校如果不能展开大刀阔斧地本质性变革,在相当程度上存在被淘汰或合并的风险。

二、高职院校治理效能提升面临的现实困境与挑战

(一)引领之困:整体建设思路缺乏特色与科学性

有不少高职院校在自我发展和建设中处于自我迷茫的状态,在推进自身建设整体思路规划的过程中呈现出两种问题表征。一是循途守辙,顶层设计路线不明确。随着教育部陆续推出国家示范性骨干高职院校建设计划,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得到充分肯定,而入选“双高计划”的部分学校受到高职示范校的影响,仍然坚持把规范化建设视为自己发展的重点,把力量都放在如何达到量化标准上,继而曲解“双高计划”对高质量的要求。“双高计划”中的“高质量”强调以特色带动,以创新引领。“双高”院校不应仅仅考虑自己是否达标,更应该根据自身发展情况建构高质量的特色化发展道路。二是盲目追新,忽视办学质量。随着内涵式建设理念深入人心,部分高职院校已经充分意识到走创新之路的重要性,极力寻求全方位的创新和突破。然而在还未明确何为新,如何新的时候,各个学校就开始进行各种大刀阔斧的改革尝试。这就导致教育质量不同程度地下降,学校优势学科被逐渐弱化。总的来看,一些院校通过

不断追求形式新颖来打造学校亮点,而对于新鲜表面下的实力支撑却缺少重视和系统性规划。极少有课程设计是建立在学科建设与社会需求调研基础上的,极少有培养方案是考虑行业企业的需求并与其相互协作完成的,极少有考核评价是建立在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与综合技能的目标之上的。^[2]另外,过于流行的东西就意味着缺少文化的积淀和对错误的包容性。高职院校若要进行课程设计、教学资源、培养目标、师资队伍和研究成果等方面的创新,就要能够为自身创新提供坚实的基础和特色化的支撑,而不是一味地去追求新的概念。缺少理论和实践支撑的创新可能带来高速度的淘汰和风潮引领的泛化。

(二)发展之困:专业群运行缺乏落实与通畅性

专业群就是由一个或多个办学实力强,就业率高的重点建设专业作为核心专业,若干个工程对象相同、技术领域相近或者专业学科基础相近的相关专业组成的集合。^[3]“双高计划”提出要集中力量建设15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但当前何为“高水平专业群”还没有权威统一的定义。尽管如此,却存在评价专业群的相对固定的标准。首先,必须面向重点产业促进资源融合和结构优化;其次,需依托校企合作建设开放共享的专业群课程教学资源 and 实践教学基地;再次,必须要有高水平、结构化的教师创新团队来保证专业群可持续发展。目前,高职院校在专业群建设理念认识和评价体制上存在缺陷,这在相当程度上阻碍着当前专业群的建设。一是对专业群建设理念存在偏差。目前,部分学校仍然存在专业群建设方案模糊不清、运行模式单一、缺少顶层设计和评价体系的情况。20世纪中期以来,学科互涉逐渐成为知识创新和学科生成的主要路径^[4],但不少高职院校仍然以单一专业建设的模式来发展专业群,从而忽视专业群最基本和最大的优势——“聚集效应”和“资源共享”。有些高职学校虽然建立起名义上的专业群,但是组群方式牵强附会,将几个相似的专业生拼硬凑进一个组群,没有真正实现专业内容、培养方案和教师团队的共通融合。这样的专业群往往与产业链、岗位群对接的契合度低,难以实现校企合作的深度融合,也无法真正实现学生在专业群不同方向中个性化的选择,不利于培养

产业所需求的复合技术性人才。二是专业群配套评价体制不完善。由于专业群建设时间尚短,配套完整的评价机制还处于缺失阶段。不少高职院校对如何摆脱单一专业评价模式的影响,实现对专业群特色化、综合化的评价还处于不断摸索的阶段,这就导致专业群建设目标不完善,评价标准出现同质化趋势,忽视不同专业群独特的价值属性,缺乏内生动力机制,从而影响专业群建设的质量。此外,受长期传统学科组织壁垒的影响,高职院校在执行过程中呈现共享理念差、共享经验少、共享模式单一的局面,这就导致专业群的集群优势不能有效发挥。

(三)合作之困:产教融合缺乏兼容与明确性

相关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企业对校企合作的总体认可度较高^[5],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产教融合在高职院校的发展中得到了实质性推广,但由于我国产教融合起步较晚,目前在制度与实践上都存在多重问题与挑战。一是“利”与“德”难以权衡。随着“双高计划”的提出,国家对产教融合的要求又提上一个新的高度。但是传统校企合作中“校企合作泛化”与“学校热,企业冷”等现象屡有发生。对此,有学者提出通过以平等促协同实现去中心化的校企资源共享来解决。实现共享的前提是校企处于利益共同体之中,而企业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学校以培养社会人才为目标。教育始终坚持“立德树人”为首要原则,产业则始终坚持“以利主导”。以营利目的为主的企业组织根据企业发展状况和市场环境来决定参与产教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以投资效率和回报率来衡量产教融合的收益。若完全实现二者的融合对接,势必会导致产业过度地干预教育,而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就会受到产业支配和影响。在“德”与“利”之间,产教融合如何实现平衡尚未有科学的解决办法。二是“双主体”培养模式不明确。在倡导实现“双主体”育人的职业教育模式时,对于“双主体”如何平衡和配合却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学校主要是给学生打好理论基础,企业则是为学生提供实践和技能锻炼。但实际过程中,高职院校虽然传授基本的理论和课业知识,但却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到提升学生的实践技能上。因此,相当一部分毕业生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对综合素质人才的要求,在国际化、复杂化、信息

化等方面表现出的竞争力较弱。而对于“双主体”育人中的另一主体“企业”在产教融合协同进行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多数也表现出不积极、不主动的态度。郑永进等人调研发现,多数企业对“学生岗位适应能力”的认可度并不高。^[6]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企业更注重投资效率的转化,但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毕业生变成现实劳动力后并没有给企业带来更多的红利。所以企业为高职院校进行资源供给和人才培养过程中,积极参与的意愿程度都较低,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制约产教融合良性发展的死循环。对于“双高计划”入选学校,国家明确表示“项目学校以服务求发展,积极筹集社会资源,增强自我造血的能力”,这就更进一步表明高职院校在谋求发展的同时必须突破自我、寻求合作以筹集资源。

(四)动力之困:内外部发展缺乏动力与突破性

高职院校与普通高校承担着不同的使命和职责,高职以就业和技能培训为导向,但是相比于普通高校的发展,高职院校在内部发展和外部推动方面均呈现出内外动力不足的问题表征。一是内部创新研发动力不足。对于内部发展,不少高职院校纷纷致力于创新研发的道路,试图用创新研发带动发展,提升自身的竞争力。高职智库数据显示,2019年134所“双高计划”院校获得发明专利的数量为1491件,而其他217所普通高职院校年专利数才为879件,占双高院校的58%。^[7]数据表明,“双高计划”院校在科研方面的实力明显强于普通高职院校。但是高职院校普遍存在难以逾越的困局:虽然学校大力推进研发和科技创新,但受到教师水平和生源质量上的阻碍;研发取得相当程度的数量进展,但是缺乏突破性、原始性的核心研究,研发质量难以保证。这些困局使得高职院校内部发展的内生推动力不足。一项关于对高职院校教师教科研能力现状的调研结果显示,职称评审不科学、科研工作功利性较强、科研氛围不浓郁、评价机制不完善以及缺乏带头人是制约教师进行科研工作的主要因素。^[8]一方面不少年轻教师有致力于科研和研发的意向,但却在发表论文时受到自身职称限制难以有所成就;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对于教师考核还没有形成科学的评价体系,造成部分教师感到科研成就感低,进而逐渐引发

职业倦怠并对研发创新失去兴趣,形成多数教师“只教不研”的局面。此外,最新统计数据显示,高职院校的科研经费支出占比极低,最高仅占3%左右,在“双高计划”院校中,一半左右院校的科研经费支出更是为零。^[9]这些数据说明一些“双高计划”院校对于科技的投资力度过小,没有认识到科技投入对于新时代高职院校发展的重要作用。二是外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动力不足。“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开展为高职院校的发展转型提供了契机,但还是有部分学校缺少前瞻性和国际化视野,盲目地自我满足于国内的市场,错失紧跟世界发展潮流的机遇,未能实现与国际信息的融合共通。白玲等人在研究中表明高职教育国际化呈现出三种实践样态:一是职教“原材料”国际化,即高职师生互访互学;二是职教“半成品”国际化,即高职携手企业走出去;三是职教“成品”国际化,即高职优质产品出国门。^[10]但是目前我国高职院校多是停留在前两个水平,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造成的:一是缺乏开放包容的心态,没有积极主动寻求合作的态度;二是高职院校自身缺乏独特优势,没有形成职教国际化品牌,在对外合作中缺少吸引力;三是学校内部系统不完善,缺乏专门负责对外交流的部门,寻找不到对外合作的有效途径。此外,有些高职院校虽然在积极寻求对外合作走国际化办学道路,但是仅对国外职教模式照搬照抄和全盘吸收,而忽视本土国情与文化的特殊性。

三、未来高职院校治理效能提升的有效路径选择

(一)明确整体思路,突破常规提升质量

办学思路顶层设计对于高职院校的建设发挥着指挥棒的作用,必须采用科学的发展思路来建构完善的质量提升机制。^[11]首先,“双高计划”院校必须要深刻领会“双高计划”中“高质量”与“引领发展”的精神,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大方向不动摇,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出发,做好学校高质量发展制度设计。入选“双高计划”的高职院校要切实承担起推动职业教育持续深化内涵建设的责任,推进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使命。其次,高职院校要在深入挖掘地方特色和优势的同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从点出发、以点带面,用优势带动全局。例如,芜湖职业技术学院精准对

接芜湖市及长三角地区产业经济转型升级对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重点瞄准战略新兴产业群,着力打造“2+N”专业群,支撑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12]广州也构建了互动机制,促进高校与城市科技创新的互动。^[13]再次,要打破常规,追寻创新路径。创新的方式、途径和重点多种多样,包括智能技术的融入、专业集群的重组、产教融合的创新、课程设计的更新、教师团队的建设等。但是我们也必须明确,创新不是对于旧事物的翻版或者重组,不是用过去的思路和解决方式来探讨新的问题,也不是换汤不换药式的覆盖和修饰。高职院校要实现结合时代需要、结合科技前沿、结合发展潮流来寻找突破方向,要有坚实的专业实力基础和完善的评价体系去支撑其本身的发展。对于创新事物的出现要从两方面进行应对:一方面要对其进行全面考核和评价,清楚地掌握其本身的利弊;另一方面要把创新扎根在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上,不要使创新流于形式和表面。

(二)专业群实现精准对接,形成特色考评体系

首先,在顶层设计上就要把专业群定位准确,精准对接国家或区域的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在组建专业群时,除面向产业链、相关的岗位群之外,还要用敏锐的嗅觉去洞察行业与时代的变化,及时调整专业结构和组群的布局,主动革新教学培养目标和课程设计,实现专业群真正与市场接轨、行业对应、产业相符和企业融合。其次,专业群评价体系要坚持突出专业特色、产业特色、群体特色和地区特色,尽量减少共性指标和量化指标对地区高职专业群发展的束缚。总的来看,专业群依赖于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又服务于地方特色,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灵活调整专业群的评价指标。要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智能技术逐步建立教师、学生、课程、设备等多种专业建设资源的数据监测平台,通过对数据的持续收集、分析与诊断,有效保障专业群建设的良性螺旋式质量提升。^[14]再次,专业群建设的逻辑导向是要集中力量去实现资源交叉和融合,以大量培养适应现代社会复杂生产的复合应用型人才。因此,专业群内的各个专业必须要打破闭关自守的局面,以开放交流的态度实现由个体孤军奋战向集体协同创新的转变。高职院校要搭建起专业群

内资源共享平台,通过多样培训提升教师团队协作教学的能力,同时也要对专业群课程的整合重组进行指导和监督,搭建起网络交叉式的课程体系来取代线性单一的课程体系。最后,专业群的建设要突破专业发展的“点”思维,实现多校多地共建的“面”思维。对于相同或相近地区,或有着相似发展背景的地区可以通过建立专业群联盟,形成地域合作、校校合作、专业与专业合作的全方位协同发展体系,并由该区域内高水平专业群牵头,联合多地同类专业群,共同开发课程和资源,共享建设成果。

(三)产教融合多方协同,科学建构“双主体”责任

产教融合是目前高职进行内涵式发展的必经之路,但企业和高职院校目标的异质性无法被改变,这就需要政府以政策法规作为辅助性手段发挥作用,以建立有效的机制来维护二者的和谐有序。首先,为主动参与产教融合的企业和院校提供科学的激励政策以激发其参与积极性,同时为产教融合建立共建共享信息服务平台,使高校和企业的信息真正实现对等和透明。其次,要推动建立企业与高校平等合作的长效机制。产教融合只有真正建立在双方需要之上,才能实现知识向真实生产力的转化,潜在劳动力向现实劳动力的转化。企业应能够在人才培养目标制定中发挥决策作用,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协同作用。与此同时,也要提供足够资金、设备、场地等资源支持学校的发展。高职院校要深度了解行业企业发展的需求,建立起相应的课程和实训体系,培养社会和产业真正需要的人才。再次,高职院校要注重教育自身规律,在进行产教融合的同时把握好学校发展的内在驱动和外部推力、学生的“软能力”和“硬能力”、校企“双主体”育人的权利与责任等各种关系。最后,高校与企业虽然在发展目标上存在较大差异,但可通过形成“命运共同体”以相互促进来减小发展目标的差异所带来的潜在冲突。企业文化的禀赋精髓有助于高职院校树立质量意识和涵养职业价值观,进而引导学生养成严谨专注、敬业专业、精益求精和追求卓越的品质。高职院校“是非明、方向清、路子正”的文化育人体系有助于淡化工业化带来的浮躁和不安,使企业决策更加理性科学,回归技术的本原价值,实现技

术价值和技术理性的和谐统一。^[15]

(四)打造对内研发创新和对外合作交流双循环驱动

高职院校若想打破桎梏,必须从内部和外部双向协作,在内走研发创新之路,在外走对外交流合作之路。在内部研发层面,首先,“研究”是目前高水平高职院校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必须要把“产学研”相结合中的研究放在重要位置。要明确高职的“研究”和大学的“研究”是不同的,高职的研究更要偏向于技术技能的创造和革新,而不是理论的突破,也没有必要要求高职的教师去变成纯粹的学术研究者。其次,要发挥教师骨干的带头作用,优化教师梯队,使高职院校教师队伍始终保持活力。要精准分层培养教师,根据团队中不同层次岗位、教育背景、职业经历等要素,开展不同类型的技能培养和强化教育;建立高水平“双师型”教师认定、引进、培养和评价全链条工作机制^[16];鼓励教师创新课程、教材、教法,成为问题的发现者和行动的研究者。最后,在校园文化的塑造上要注意树立学生的精品意识,创新意识以及效率意识,在不断提升学生实践技能的同时启蒙其科研创新意识。在对外交流合作层面,高职院校要积极采取“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的战略,有效提升我国高职教育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不同类型和水平的学校需要制定不同的发展规划,水平较高实力雄厚的高职院校就要凝聚资源,在“品质”和“特色”上走出优势,深入了解目标区域的政策法规和所需要的人才规格类型,将海外企业之需、目标家国之需作为自身合作的起点,积极寻求合作;实力稍微薄弱,对外合作缺少经验的高职院校应该首先积极学习和吸收他人合作的优秀经验,努力提升自身实力水平。总的来看,在统筹自身客观条件与实际需求基础上,高职院校要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等政策的扶持,有效提升对外交流合作的治理效能与水平。

参考文献:

- [1]黄旭东,田启波.结构化理论:吉登斯现代社会变迁思想的理论基础[J].兰州学刊,2009(6):114-116.
- [2]徐国庆.高水平高职院校的范型及其建设路径[J].中国高教研究,2018(12):93-97.
- [3]袁洪志.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探析[J].中国高

教学研究,2007(4):52-54.

[4]胡德鑫.学科演进视域下新工科建设制度困境与行动路径[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0(3):49-54.

[5][6]郑永进,吕林海.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现状调查——来自全国1400余家合作企业的调查[J].中国高教研究,2017(9):94-98.

[7]中国高职发展智库.2019年全国高职院校发明专利授权排行榜出炉[EB/OL].(2020-10-30)[2021-05-21].<http://www.zgggzk.com/redianzixun/shownews.php?id=772>.

[8]赵淑琪.高职院校教师教科研能力现状调研及提升策略[J].教育与职业,2019(21):85-88.

[9]中国高职发展智库.2所院校增幅超100%!“双高”院校2019年决算大公开[EB/OL].(2020-11-09)[2021-05-21].<http://www.zgggzk.com/redianzixun/shownews.php?id=776>.

[10]白玲,安立魁.“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实践样态与推进策略——基于全国1344所高职院校质量年度报告的分析[J].职业技术教

育,2020(22):20-25.

[11]胡德鑫.新世纪以来德国职业教育质量保障的基本路径与支撑机制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0(15):63-70.

[12]高武,吴庆国.“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治理现代化的理性思考及实践路径——以芜湖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职业技术教育,2020(21):31-35.

[13]曾一帆.高校与城市科技创新的互动——以广州为例[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19,19(3):101-105.

[14]覃川.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定位与内涵发展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0(23):57-63.

[15]刘晶晶,和震.“双高计划”高职院校深化产教融合的维度及内涵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20(17):52-58.

[16]隋秀梅,高芳,唐敏.“双高”背景下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0(5):93-96.

责任编辑 张德诚

The Development Path, Realistic Challenges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Double-high Plan”

HU Dexin, CHEN Runge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4)

Abstract: As a major strategic plan to cope with the new round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double-high plan” has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for building high-level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professional groups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us forming a new pattern of resona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The results show that, based on the self-development ability and external support of social structure theory, vocational college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different development paths: self-construction, collaborative cooperation, dependent development and passive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the current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mainly faced with multiple institutional dilemmas, such as the lack of overall construction ideas, the poor operation mechanism of specialty groups, the singl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mode and the lack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orces. Furthermore, 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effective path to improve the governance efficiency of high-level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e future, that is, to clarify the overall thinking, and break through the routine and promote the quality; to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 group to connect with the industry accurately, and form a characteristic evaluation system; to promote the diversified coopera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colleges, and scientifically construct the double-subject responsibility; an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dual cycle drive of domestic R&D innovation and foreign cooperation.

Key words: “double-high plan”; professional group;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ocial structure theory;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